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论丘士珍《峇峇与娘惹》和方北方 《娘惹与峇峇》的人物形象塑造

科目编号: UASZ3063

学生姓名: 范珮琳

学位名称: 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 曾维龙师

呈交日期: 2011年4月1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动机和目的.....	1
第二节：研究背景.....	2
第三节：研究方法.....	4
第四节：论证架构.....	5
第二章 文献回顾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峇》和《娘》文献回顾.....	8
第二节：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社会历史批评理论.....	13
第三节：作为现实型文学的《峇》和《娘》	15
小结.....	18
第三章 人物形象分析	
第一节：《峇》和《娘》的“峇峇”形象.....	19
第二节：《峇》和《娘》的“娘惹”形象.....	21
第三节：新客的典型形象——《峇》的“阿美”、《娘》的“李天福”	23

小结.....	28
第四章 文本中的批判意识	
第一节：《峇》和《娘》对社会历史的批判意识.....	30
第二节：《峇》和《娘》对“峇峇”自我身份认同的批判.....	35
小结.....	39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研究成果.....	40
第二节：研究限制与未来建.....	41
参考书目.....	43

论丘士珍《峇峇与娘惹》和方北方
《娘惹与峇峇》的人物形象塑造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8AJB02078

日期：2011年4月15日

摘要

本文主要以两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即丘士珍《峇峇与娘惹》和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针对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塑造，进行分析与比较。两篇小说分别是马来亚战前与战后的作品，当中同样描写了一个峇峇家族的兴盛直到没落的过程，反映了英殖民底下峇峇家庭与社会的状况。本文以社会历史批评的方式解读两篇小说，以便进一步探讨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意义、作品的社会价值，以及作者在作品中表现的意识与情感。

两位作者皆来自中国，在马华文学史上个别在战前与战后占有代表性的地位。战前的丘士珍《峇峇与娘惹》反映不良的家庭风气，到方北方《娘惹与峇峇》，反映人民思想的改革，到民族教育的重视，他比之战前的作家，更加对马来亚拥有一股热忱。小说属于现实型文学，内容主要反映某个时期的特定社会背景，人物与情节多贴近历史与现实。

本文以《峇峇与娘惹》的峇顺、娘惹、阿美来与《娘惹与峇峇》的林峇峇、林娘惹、李天福作比较。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马来亚社会中的“峇峇”、“娘惹”以及“新客”的典型形象，虽然他们拥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位作者借由人物塑造所表现的意识却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将以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础作为研究两篇小说的方式，通过对马来亚战前战后历史背景的了解，来阐述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作品背后的意义。两位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分别表现的两种不一样的社会意识。由于是战前与战后的作品，在经过二战以及日治时期的洗礼，马华作家对马来亚这片土地的情感，也同时产生了变化。本文亦将说明两者在批判的意识上的不同，并比较当中的转

变。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由于时间安排上的疏忽，导致笔者无法阅读两名作家更多的作品，以更深入地探讨他们作品中所涵盖的思想，以及他们对马华文坛所作出的贡献。

战后的马华作家对马来亚已经有了更深一层的“国家”观念，因此在《娘惹与峇峇》中可以见到作者对本身的民族文化的焦虑感，由于担心自身的文化会像峇峇们一样被当地环境所同化，因此作者在作品中强调了华教的重要性。这种富有教育性的作品对现今的教育制度仍然可以起到警惕的作用，让社会上某些对华教漠不关心，甚至是一无所知的华人作一番的自我反省。

致谢

三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转瞬间消逝了，感恩在大学里所遇到的、邂逅的一切人事物，感恩一切成为我生活中点点滴滴、起起落落、悲欢离合的人事物，这一切让我体验不少，收获不少，更让我成长不少。

首先感谢曾维龙老师在本毕业论文上的指导。本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我耽误了论文交稿的行程，没有准时交稿，也没有达到老师的基本要求，于此对老师致万二分歉意，也很感激老师总是在百忙之中还要查看我那些杂乱无章的作品。老师让我更清楚整篇论文撰写应具备的结构，因此得以在理清思绪后方才扣紧题目下笔，更让我看清了三年来我在撰写研讨课作业时常犯的错误。虽然本论文并不是精彩绝伦或独创一格的佳作，但确实让我获益不浅。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很多矛盾，还常常对自己所写的内容感到疑惑，老师往往一语惊醒梦中人，因此，非常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超强耐性。

另外要感谢家人和朋友一直在适当的时候给予督促和鼓励，很幸运不管何时何地，身边总是有不吝伸出援手的朋友。搜集资料方面，由于家乡离学校有很长一段距离，因此要另寻图书馆，很感谢李崇芳、黄宝琪、李慧珍和余慧美在上个学期的长假中多次陪伴我到南方学院图书馆去查找资料。同时，也很感激锺雯柔借出她的理论书籍，以及协助我向马大的中文系同学借阅参考资料，让我得以对本文研究对象有更多方面的知识。

感谢一切协助过我的，和批评过、教训过我的老师和同学。因为跌倒过，我所以能更坚强地面对困难。最后，对拉曼大学致上万二分谢意，感谢这里让我度过三年开心、难忘的大学生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动机和目的

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是 1932 年发表的文章，作品描绘了马来亚战前一户峇峇家庭的景象，并以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这一段时期作为峇峇没落的背景，真实地勾勒出人民在殖民地底下的生活状况，以及经济萧条为他们所带来的打击。而方北方《娘惹与峇峇》则是战后的作品，叙述了一个南来华侨以及他的子孙在马来亚生活的经历，表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表现了南来知识分子在作品意识上的转变。因此，本文希望从两篇描写关于峇峇家庭的小说中一探战前与战后的马来亚社会状况，以及作者在小说背后所表现的不同批判意识。

小说中的峇峇娘惹把自己的祖家归为英伦，但在许多习俗方面却仍然遵守着传统的中国习俗，因此他们的言语举动在外人眼中成了矛盾的行为。这些都是社会环境所培养出来的现象，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当时峇峇的社会形态，看社会如何影响他们，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特殊的思考方式。

两篇小说分别是战前与战后的作品，两位作者在文本当中加入了他们对社会所作出的批判，因此本文也将分析两个文本当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希望能一窥战前与战后时期的作家如何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做出批判与讽刺。本文也通过对两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进行比较，以从中探讨马华作家在这两段时期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以及他们作品中意识转变的状况。

第二节：研究背景

丘士珍《峇峇与娘惹》和方北方《娘惹与峇峇》分别发表与 1932 年和 1954 年。《峇峇与娘惹》是马华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作者丘士珍于 1905 年 12 月出生于中国福建龙岩，南来后担任教师，于 1929 年开始在檳城报章发表作品。¹《峇峇与娘惹》描写了一个峇峇家族从兴旺至没落的经过，而这家族里的种种荒唐事件，便是导致其衰败的主要原因。小说中的故事背景为战前的马来亚，这时期英政府所统治的海峡殖民地马六甲、檳城和新加坡是中国人移入的主要地方，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当地主要的华商是峇峇，所以当时峇峇人的社会地位是在新移民之上。²由于峇峇在马来亚经商已有一段时期，因此这时的峇峇多数属于较富有的商人。但小说并不花唇舌来描绘这个家族是如何地雍华荣贵或富丽堂皇，至少从可阅读到的章节开始直到故事结束，都只讲述了家族成员们所发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乱

¹ 马伦：《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书辉出版社，1991 年，页 282。

² 陈志明：〈关于被涵化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若干问题〉，何国忠：《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华社研究中心，2005 年，页 40。

伦关系，以及荒唐可笑的家庭内讧。小说明显地带出了道德沦丧是这家族必然衰败的原因，当中角色除了阿美与家中女佣外，其余的家族成员关系都乱成一团。阿美的形象单纯而正义，与整个环境以及成员形成极大的对比，最后更以女强人的形象，告发了自己的丈夫合谋姐姐杀害父亲的事件。

《娘惹与峇峇》则是战后的作品，方北方原名方作斌，祖籍广东惠来，1918年出生于中国广州，1928年南来并在槟城钟灵中学念书，1937年已在新马报刊发表作品，同年返回中国。1945年他接获槟城家人的来信说伯父被日军炸死，1947年返回槟城，战后担任槟城韩江中学教师多年。³

《娘惹与峇峇》里，作者在第一与最后章节使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作者与林细峇的邂逅。后来作者成为旁听者，第二章节开始使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转述林细峇所说的发生于四十年前的事情。故事背景年代便是从大约1910年开始讲述。1910年的中国正面对内忧外患，前者是为了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而有孙中山等人积极展开反清的革命行动；后者则是在鸦片战争过后接踵而来的列强，对中国被强硬打开的大门蜂拥而入，企图在这片广大而优渥的国土内分一杯羹。⁴连年的战乱致使许多中国南方如福建、广州以及广西诸省的人，就地理位置上的方便而航渡到南洋，欲寻求更好的收入以便可以改变家人的生活状况。小说中其中一个主要人物李天福便是居住在南中国汕头的贫穷小伙子，他是随着荷兰政府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所开设经营的“猪仔行”卖身到苏门答腊的一个城市“日里”去。欧人殖民政府为了开

³ 马伦：《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页98。

⁴ 参阅自傅乐成：《中国通史》，弘扬图书有限公司印行，民国六十六年，页695-710。

辟殖民地，发展商品生产，扩大通商贸易，特别是获得中国商品，而必需招徕华侨，荷兰政府自十七世纪开始便极力以贷款或者降低人头税的方式来诱使华侨涌入南洋。⁵投身于异地的人们用血汗在南洋打拼了几年，没成就的不是没有面子再回乡，便是为了避免再回去面对动荡不安、三餐不能温饱的日子而留在南洋；有成就的则会为了管理自己打拼出来的产业而在南洋与当地的原著民另组家庭，于是乎“峇峇娘惹”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文化交融而自成一格的新景象。

《娘惹与峇峇》文本的外层是叙述华侨在南洋的生活状态，而其深层结构则是以三代父子孙的不一样的思想观念来揭示当时中国社会以及南洋社会的政策、教育状况以及人民的各种观念等等。

第三节：研究方法

本文将通过使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侧重在文本所反映的现实社会背景，并且通过小说中所描绘的真实环境，反映作者的批判意识，以及作者所要带给读者的信息。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主要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的社会作用。⁶本文根据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将

⁵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30-140。

⁶ 王先霈 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页63。

两篇小说归类于现实型文学⁷小说。两篇小说分别刻画了两个不同时代底下的南洋社会历史，故本文收集与参考前人对两位作家的评论，以解读文本来进一步探讨作者在文本中表现的思想意识，以及它们对当时或者后世社会所产生的社会价值。

《峇峇与娘惹》和《娘惹与峇峇》真实地再现了马来亚战前与战后，两个峇峇家族的兴盛与衰亡过程，并从中揭示了当时社会上所关注的两个问题，那就是女性地位以及民族教育的重视。小说塑造了多个社会上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的形象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心态，故本文也将分析与比较两篇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看战前与战后的马华作家如何塑造当时的人物，从而让读者得以探析这两个时期人们在思想与观念上的变化。

第四节：论证架构

本文第一章为绪论，第一节说明本文的研究动机和目的，既以《峇峇与娘惹》和《娘惹与峇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比较，来探讨马来亚战前与战后的人民生活状态，以及这两个时期的作者所关注的不一样的社会议题。第二节概述两篇小说的故事内容与社会背景，以及作者的简介。第三节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即以社会历史批评的方式解读两篇小说，以便进一步

⁷ 现实型文学是一种侧重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学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再现性和逼真性。再现指对外在客观现实状况作如实刻画或模拟；逼真则指以写实的手法，按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精细逼真的描绘。 详见于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页186。

探讨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意义、作品的社会价值，以及作者在作品中表现的意识与情感。

第二章的第一节主要回顾前人对两篇作品以及两位作者的评价，两位作者皆来自中国，在马华文学史上个别在战前与战后占有代表性的地位。从战前的丘士珍《峇峇与娘惹》反映的家庭风气，可见这些不良风气是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到方北方《娘惹与峇峇》，作品从反映人民思想的改革，到民族教育的重视，他比之战前的作家，更加对马来亚这个国家拥有一股热忱。

第二节说明本文将以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础作为研究两篇小说的方式，通过对马来亚战前战后历史背景的了解，来阐述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作品背后的意义。第三节则说明小说的类型，由于小说属于现实型文学，内容主要反映某个时期的特定社会背景，人物与情节多贴近历史与现实，因此适于使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式解读。

第三章将进入文本，进行两篇小说中的人物比较。本文以《峇峇与娘惹》的峇顺、娘惹、阿美来与《娘惹与峇峇》的林峇峇、林娘惹、李天福作比较。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马来亚社会中的“峇峇”、“娘惹”以及“新客”的典型形象，虽然他们拥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位作者借由人物塑造所表现的意识却有所不同。

第四章将进一步分析两位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分别表现的两种不一样的社会意识。由于是战前与战后的作品，在经过二战以及日治时

期的洗礼，马华作家对马来亚这片土地的情感，也同时产生了变化。本章将说明两者在批判的意识上的不同，并比较当中的转变。

第五章为结语，总结本文对于两篇小说的比较成果，并提出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限制，以及对未来想要对这两篇文章进行研究给予建议。

第二章 文献回顾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峇》和《娘》文献回顾

丘士珍《峇峇与娘惹》的写作背景大约是 1930 年左右，在杨松年的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分期里，将这段时期称为“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⁸，这时期的文艺界并没有马来亚这个明确的地理概念，一般的文艺工作都以南洋为对象，因此在提倡地方色彩的时候便将之称为“南洋色彩”。

在《峇峇与娘惹》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峇峇家族因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关系而面对经济的困境，家中的老爷不惜把女儿娘惹嫁给一个年老暴戾的商人，以换取生意上的利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惨痛回忆，在 1930 年初的时候已近逐渐消逝，马华文学界中这方面的题材也到了相当饱和的地步，而南洋的经济恐慌这个切身问题也出现了，加以本地青年作者这时候多已成熟，能够摆脱对于中国作品的模仿而运用起当地的题材来，于是，新兴小说从此普遍趋向于当地生活的描写。这时，许多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反映了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怒涛冲击下的南洋社会的现实，如胶价锡价的惨跌，失业浪潮的汹涌等等。⁹而这篇小说中便以其中的一个人物峇顺，反映了在殖民教育

⁸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 年，页 55-262。

⁹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UCSCAM)，1986 年，页 75。

底下的峇峇从一个富裕的子弟变成没有经济能力的状态，以及经济大受打击下的南洋社会状况。

对于 1930 年的马华文学，方修于《马华新文学简史》提出了有关新文学创作内容的主张，即：着重正面描写；注意新兴阶层生活的宣扬；要有鼓舞的气氛等，同时他也提到了“地方色彩”的阐释，作家滔滔指出南洋文艺应该有其地方色彩，其积极方面是反映各民族劳苦群众从事组织与改革的文艺，消极方面应该是反封建或暴露黑暗的文艺，而且应该和社会改革运动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晦地联系着。¹⁰《峇峇与娘惹》描绘了一个伦理关系复杂，道德观念沦落的峇峇家族。在遇到经济大萧条生意惨败的时候，家中老爷便终日躲在烟馆吸鸦片，而儿子峇峇也因为家中经济萧条的关系从英国辍学回家。他为了花天酒地而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娘惹也因为家道中落而被丈夫虐待，沦落到成为妓女的地步。方修把丘士珍列为具有客观主义的倾向者¹¹，认为他的这篇小说色泽暗淡，气氛低沉，冷静与客观地描写了当时马来亚不景气底下的一般现象。

许文荣则认为作者在描写这个峇峇家族的乱伦事件时，并没有以中国式的“大伦理主义”来痛斥他们，而只是以南洋社会的观点说故事，尽量隐蔽中国意识。作者让叙述深入到主人公家庭内部的情景中去讲述他们的畸恋，并把这种不寻常的关系与南洋的家庭风气联系起来。在小说中亦具体地

¹⁰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页 81。

¹¹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页 122。

描述了警方查案与法庭审判的过程，表现了当时的西式的南洋司法制度。因此，许文荣认为《峇峇与娘惹》是马华文学本土化的其中一个典型案例。¹²除此之外，小说中有不少本地的马来或方言译文，如“亚答厝”、“马打”、“公班牙”、“弄帮”等，到了方北方的《娘惹与峇峇》的时候，这类的用语就更为频密了。这些对南洋色彩文艺的强调，对后来的马华新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战后马华文学界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倡便是与这时期的南洋色彩文艺的倡导是一脉相承的。郭惠芬认为，南来的作者出生于中国，来到新马时还是侨民的身份，他们认识到文学必须摄取现实题材，反映“此时此地”的新马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承袭中国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对积贫积弱的祖国和灾难深重的民族寄予深切的关怀。¹³因此《峇峇与娘惹》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战前南洋的家庭风气，并且揭露了经济衰弱的国家底下的人民生活状态，以及人性在遇到挫折时的软弱一面，从人物形象的刻画中给予读者启示。

《娘惹与峇峇》写于战后约 1954 年，杨松年将这段时期分期为“本地意识的拓展时期，反对黄色文化时期”¹⁴ 由于 1948 年英殖民政府对马共实施紧急法令，管制民间的结社与出版活动，禁止左翼政治运动，因而导致

¹² 参阅自许文荣：〈战前马华文学的南洋书写：最早的本土性建构与本土意识的萌发〉，何国忠：《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页 218。

¹³ 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对马华新文学的贡献〉，江洛辉：《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99 年，页 239-242。

¹⁴ 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页 55-262。

马华文学消沉下来。¹⁵这样的时期，有的作者会以激励的语调来劝勉当时的人们，但有些却会步入歪道，走上以黄色、色情的写作路线来反映个人的消沉情绪。这种不良的文风间接引起了各种的社会问题，因此文化机构、学校等机构便纷纷办起反黄运动，以扭转紧急法令实行后文化界陷入消沉的危险状态。¹⁶方北方便是这个时候具有积极和鼓励作用的代表性作家。战后使到新马作家更加感到对社会的责任感，尤其在日本侵略新马的时期，唤起了人们的普遍觉醒，因此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主独立自主的意识高涨。¹⁷方北方《娘惹与峇峇》便展示了新马社会从战前至战后的社会变迁。逍遥天在为方北方的再版《娘惹与峇峇》作序时，便说到此小说反映了英殖民地时代某些唐人的错误观念与错误打算，进而演成惨痛的悲剧。¹⁸小说中的年份概括了自 1910 年至 1950 年之间的社会背景，以塑造祖、父、孙三代人的形象，来带出当时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人士的典型状态。并且描述了这些人物在时代的变迁下，如何随着时代的洪流一起改变，真实地反映了战后以及日治时期的马来亚的社会背景，揭露人民在殖民教育底下所受到的弊害，提醒了读者醒觉以争取民主与独立的重要性。

¹⁵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页 241。

¹⁶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页 243。

¹⁷苏卫红：〈从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看当时新马华人社会变迁〉，杨松年 王慷鼎：《东南亚华人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 9），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联合出版，1994 年，页 169。

¹⁸方北方：《娘惹与峇峇》（再版序），教育出版公司印行，1964 年。

伍良之在赏析这篇小说时亦说到方北方在小说中如实地反映了娘惹峇峇社会的意识形态。¹⁹小说中，作者描述了峇峇娘惹在殖民教育的熏陶下，成了自以为是“英伦子民”的华人，他们拥有富裕的家当，接受西式教育并能够操英语，这些都是当时峇峇娘惹的特征。由于方北方在马来亚执教多年，因此，他对教育课题更为敏感与关心，连士升为《娘惹与峇峇》作序时便说到，方北方多年的侨居身份使他对于教育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比一般人有更彻底的认识。²⁰因此方北方在这篇小说中，特别关注了峇峇娘惹如何被英殖民教育影响而遭到惨痛的教训，从而强调了民族教育的重要性。

2009年萧叶为方北方出版了《方北方全集》，以纪念方北方在马华文坛上的贡献。他在全集的序中称方北方为“马华文学的播种人”，方北方在马来亚从事教育四十一年，写作了五十年，国家教育、种族矛盾、华教危机等华社的切身问题皆一一呈现在他的小说中，同时在马华文坛拓荒期的前辈作家当中，他也是最具代表性地位的。同时萧叶也引用了林水椽的话：

“方北方的作品里跳动的是时代的脉搏，反映的是我国华人典型生活……方氏对本邦华人的拓荒事业有深入的了解和体验，对现实生活精到的观察，因此他往往能真挚而深刻地描绘出本邦社会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²¹在潘碧华为《方北方全集》所作之序中，她更提到《娘惹与峇峇》的创作，是作者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日活动后，对马来亚土地有了感情，开始改变了对国

¹⁹伍良之：《方北方作品赏析·得鹿失鹿都是梦——娘惹峇峇的梦》，Semarak Publishing，1998年，页53。

²⁰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页2。

²¹参阅自方北方：《方北方全集》，吉隆坡：方北方全集出版工委，2009年，页6-10。

家的认同感，使到侨民意识转弱，而在作品中把个人思想转向马来亚社会发掘创作的题材。²²确实，从方北方在小说中对峇峇娘惹教育的关怀便凸显了他对马来亚土地的认同感。

杜丽秋〈新马华文短篇小说发展论略〉中提到，方北方的长篇小说是从纵的方面展现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而他的短篇小说则是从横的方面切取华人社会的横断面，展示华人生活的千姿百态。²³丘士珍《峇峇与娘惹》既可说是从横面的方向，以一个家庭的各个成员峇顺、娘惹，以及阿美来反映了战前峇峇的家庭风气以及经济大萧条下社会背景；而方北方《娘惹与峇峇》则是以纵面的方向，以祖父孙三个不同年代的人物，既李天福、林峇峇、林细峇，反映了战后时期三种不一样的思想观念，以及展现了三个年代的社会背景。

第二节：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社会历史批评

本文使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式，来进行两篇小说的解读，并从中带出战前与战后的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和情感意识的变化。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主要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的社会作用。²⁴故本文

²² 参阅自 方北方：《方北方全集》，页 26。

²³ 杜丽秋：〈新马华文小说发展论略〉，江沼辉：《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页 326。

²⁴ 王先霭 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页 63。

在两篇现实型小说当中，侧重于使用社会历史批评对人物塑造的解读，来分析作者塑造的环境与人物，而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所要带出的教育性价值观。

两篇小说的人物塑造皆属于平民阶级的人士，他们跟随社会历史发展的脚步而改变其人格。如《峇峇与娘惹》里的峇顺与娘惹，他们身处于一个污秽淫乱的家庭底下，常常耳濡目染父亲与阿姨私通、阿姨与车夫们眉来眼去，以及阿姨总是对峇顺调情等的情况。处于青春期的他们也因为这样的环境而受到身心的影响，而模仿起大人们的行为来。在世界经济萧条使到峇峇家道中落的时候，由于家中掌握实权的老爷也自甘堕落，峇顺便也开始变得好吃懒做，甚至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阿美在小说中形象则不同，她在岁月的增长下，她看到了身处的家庭丑恶的一面，也看到她的同学如何受到夫家的虐待而投海自杀。她渐渐地认清到女人在当时的地位是多么脆弱，便开始摆脱了她原来天真、浪漫的性格，在环境的促使下，她变得坚强、独立。在《娘惹与峇峇》里，李天福亦是从一个年轻有朝气的小伙子，他在不断遇到了挫折，加上年纪逐渐增长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阿谀奉承的人。身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底下，像他那样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只能靠着当地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帮助才能“出人头地”，因此这样的观念也就培养了他日后的性格。林细峇则是这篇小说中的理想形象人物，他由于自小接受到良好的中国式教育，拥有开明理智的思想，纵然自小父母离异，父亲林峇峇也对

他不多理会，但就是这样的关系他脱离了峇峇们错误的观念。他也是为这个家族带来希望与转折的象征。

小说当中这些理想与丑恶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影响读者们的情操。因此这也是文本为社会带来的一种贡献，它负担起启蒙和匡正时弊的作用，提醒了当时，甚至是现代的人们自我觉醒的重要性。

第三节：作为现实型文学的《峇》和《娘》

本文采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中，童庆炳对文学作品类型的归类模式，将两篇小说归类为现实型文学。童庆炳在书中提到，他们根据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不同反映方式，把作品分为现实型、理想型和象征型三种类型，而现实型是一种侧重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学形态，基本特征是“再现性”与“逼真性”。²⁵本文所选的两篇小说皆属于此类型文学，它们逼真再现了马来亚战前与战后的社会状况，反映了殖民地底下的人民生活与心态，而作者对于人物的刻画，更是符合了当时环境底下人民的典型形象。如两篇小说中《峇峇与娘惹》的峇顺和《娘惹与峇峇》的林峇峇，他们都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弟，从小接受英式殖民教育的熏陶，由于英殖民的教育灌输他们如何成为效忠英国的子民思想，因此他们往往自认为是英伦的子民而对南来的新客常常抱以轻视的态度。他们是

²⁵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页 185。

当时典型的峇峇形象，凭着父亲在南洋经商致富的条件，成为南洋上流社会的子弟。

《峇峇与娘惹》中的娘惹，她是身处于弱势的女子，在社会甚至是家庭中没有主导权，往往就算是生气了却连发脾气的资格也没有。像她这样的女子只能任家中男人所摆布。当娘惹的父亲要将她嫁给一个恶劣暴戾的老头子商人时，她也无力反抗，就算受到丈夫的虐待，也只能逆来顺受。《娘惹与峇峇》中的林娘惹则不一样，她自小受到英式的殖民教育，有良好的教育水平。西方的思想使她性格开放热情，甚至于可以在丈夫去世以后独自带大儿子，以及打理父亲遗留下来的产业，是个典型的女强人。两篇小说中的娘惹分别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不同领域的娘惹形象。

而《峇峇与娘惹》中的阿美和《娘惹与峇峇》中的李天福，则是典型的中国南来的华侨形象。阿美从一个保守内向的南来姑娘，到了南洋以后籍着峇顺家庭的富裕也进入了英校就读。自此她也接受了西式开放自由的思想，而变得热情活跃。但由于她是南来的华侨，对于伦理观念始终是非常重视，因此在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竟然是如此充满了淫声荡气的时候，她内心仍然非常痛苦与挣扎。最终她为了争取自己的自主权而与峇顺娘惹反抗，逃离这个污浊的家族。她的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目睹当下社会的不良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惟有改革才能让人们觉醒，以去除这些不良的社会问题与家庭风气。李天福则是 19 世纪“卖猪仔”到南洋来的典型代

表。他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不停地受到挫折以后，逐渐失去了年轻时充满理想抱负的态度，忘了家乡的恩恩怨怨，在时间的冲洗下渐渐在南洋落地生根。他在生理上与经济依靠的需要下，入赘于林娘惹家，终于成为了一个抬不起头的丈夫和父亲。在峇峇们的眼里，他就只不过是一个从事劳动工作的下等阶级人士，因此得不到儿子林峇峇的尊重，最后只能郁郁而终。他像当时许多南来的侨民，他们为了生活在南洋落地生根，并与当地女子另组家庭。而身为劳动阶级的他们在峇峇们的眼中就像李天福一样，在社会上的地位卑微，以至于养成了在金钱面前低头的软弱性格。

这些形象塑造就像镜子般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现象，符合了现实型文学在人物塑造方面，力求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客观条件的条件。而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发展变化起到极大制约作用，因此它亦成为人物行动的重要依据。这种立足于客观现实的创作方式，便是现实型文学中“再现性”的特征。而文本的“逼真性”，则如《峇峇与娘惹》中描述的经济大萧条事件，作者具体刻画了整个家族在这个事件中如何被影响，以至家道中落、家破人亡的过程。又如《娘惹与峇峇》，作者描绘了日治时期人民如何生存在恐慌的环境底下，而为了生存，林峇峇甚至把新娶的妻子也给了日本军官，巴结日军以便在这个慌乱的时代底下捞取利益。除此之外，作者更描绘了南洋独有的景色，如《峇峇与娘惹》中，作者描绘峇顺家中的客厅摆设、用“星洲本埠”来揭示故事背景的所在地，以及《娘惹与峇峇》中描写“中午赤道的太阳”、“榴莲季节”、骤雨过后的橡胶园等等。这些文本当

中的描述逼真地再现出特定历史时代的生活环境，能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

小结：

《峇峇与娘惹》和《娘惹与峇峇》分别以战前与战后作为故事背景，从分析两部小说的过程中，可以一瞥马来亚从战前过度到战后马来亚独立前的社会状况，如经济不景气对南洋带来的影响，或是殖民地底下的教育状况，橡胶业在马来亚的发展，日军侵占马来半岛等的描写。更重要的是作品意识上的转变，既从丘士珍对家庭伦理与女性自主权的关注，到方北方对教育与人民国家意识的重视。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而文学本质上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且它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的模仿和表现，而且也随着社会、时代发展而发展。²⁶文本以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影响下，塑造了如峇峇、娘惹、南来新客等人物的典型形象，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生活，揭示了华侨在居留多时的南洋土地上，想要获得人权上、经济上保障的愿望。

²⁶ 王先霈 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 68-69。

第三章：《峇》和《娘》的人物形象分析

第一节：《峇》和《娘》的“峇峇”形象

丘士珍《峇峇与娘惹》的峇顺从小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长大后也成了个典型的败家子。他自小接受英式的殖民教育，会拉“梵哑铃”、跳舞、吟英文诗，肃然是个英国绅士的模样。但是由于家中不良的乱伦风气，使他的人生踏入了悲惨的下场。他的阿姨除了时常在家中与峇顺的父亲同床共枕，在峇顺中学的时候，还时常对峇顺调情，使峇顺在青春期便觉得乱伦是理所当然的事，进而与自己的姐姐发生了不寻常的关系。为了掩饰这段不伦之恋，他娶了表妹阿美。

虽然，他一方面还是把对姐姐的爱埋藏在心的深处，他在追求阿美的时候，却不曾顾忌到姐姐的痛苦，现在自己的目的达到了，结婚了，而姐姐恰在这个当儿病了，怎么不使他悲感，怎么不使他愧对从小爱到长大起来的姐姐呢？他完全陷入一条爱的矛盾的夹道里去了。他这才懂得点男女相爱的意义。²⁷

他们的恋情被阿美发现以后，老爷便把峇顺送到伦敦去留学。后又因家族生意遭经济大萧条所影响而中断了在英国的学业。从英国返家的峇顺面

²⁷ 丘士珍：〈峇峇与娘惹〉，方修：《马华文学大系1919-1942》第4册，香港：世界出版社，2000年，页35。

对的，是自己已经不爱的妻子，终日不理家事躲在烟馆抽鸦片的父亲，以及又与另外一位车夫私通的三姨。这时候才 19 岁，并且从小便娇生惯养的峇顺根本无法面对这面目全非的家庭，因此他也跟着堕落了。在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他把家中值钱物品一一变卖，甚至与姐姐还有三姨串通起来谋杀自己的父亲。峇顺在小说中正如伍良之所说的，他们是峇峇娘惹社会的典型产物，他们学会洋人的语言、乐器、礼仪等，事实上这些文化并不属于他们，使他们只能一味地模仿洋人，而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典范。

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里的林峇峇一如《峇峇与娘惹》的峇顺一样，只是一味地模仿，恨不得使自己变成英国人。林峇峇在聚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的环境下长大，母亲林娘惹对他百般迁就，加上林峇峇从小在英校的成绩优异，学习和模仿洋人的能力更是高强，因此导致了他不可一世的傲慢态度。他总是以自认为是英伦子民而感到骄傲，看不起南来的新客，却对洋人彬彬有礼。他从来不与中国的亲戚打交道，对于中国礼仪更是一概感到反感。在他结婚时母亲要他给亲戚敬茶，他对此感到不耐烦，

林峇峇听到母亲的意见后，很不高兴地说：“我不能这样做：根本我就不认识这班人，要叫我对他们怎样有礼貌……”停了一下，接着又这样说：“至于要我们跟这班人致敬茶礼，那更完全做不到！”²⁸

²⁸ 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页 110。

林峇峇从没接受过中国式礼仪的教育，加上对新客的偏见，认为他们都是来自低下阶层的人士，因此从不主动跟这些人交往，更别说对他们有礼貌。

在日军占领马来亚的时候，林峇峇变本加厉，他靠自己会说英语，能与日军沟通，将自己的新娶妻子让给日本军官，从中获得利益。这时的林峇峇完全成了日本人利用为开发赌馆的赚钱工具，然而他还非常洋洋得意，每天沉迷于酒色当中，在日本投降以后，身边的人都离开了他，连包养的女人也投到别人的怀抱里去了。这时的林峇峇真正地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直到他再一次看到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也没关心过的儿子，发现自己唯一剩下的只有儿子了，他才恍然大悟自己是多么愚蠢。在这些峇峇的形象中，作者让读者看到，无论多么优秀聪敏的人，没有良好的文化与教育制度，他们都可能会成为社会底下的寄生虫。两篇文本突出了作者对社会教育的关怀，他们以反映峇峇们错误的观念，最终导致悲惨结局的下场，提醒了读者教育制度的影响力，不只是在 19 世纪的马来亚，对于现代的马来西亚人来说，这仍然起到了警惕的作用。

第二节：《峇》和《娘》的“娘惹”形象

《峇峇与娘惹》里的娘惹性格内向而软弱，她在整个家庭的不良风气影响下，亦成了另外一个牺牲者。她目睹父亲与阿姨的不寻常关系，常常幻

想着他们缠绵的画面，对于处于青春期，加上思想被禁锢的娘惹来说，男女之间的事充满了好奇和吸引力。于是娘惹错把感情投入到她弟弟的身上去，使她误把对弟弟的爱当成了对爱情伴侣的爱来看待。

惹躺在床上只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冥想阿姨和他的父亲在做着那不可告人的玩意儿。

她的芳心不住地波动起来，她又想起可爱的弟弟，真是愚笨得可以，也不晓得偷偷地跑来和阿姐一块儿睡觉，两个人冷清清地隔在咫尺，她不禁深长地叹了一口气。

然而，惹正在想入非非的当儿，一条黑影浮现在她眼前！

于是，她和他屏气静息地在床上颤动着。²⁹

这段恋情使娘惹陷入痛苦，尤其是在峇顺娶了阿美以后，她变得忧郁并且病重在床。在家道中落的时候，娘惹还被父亲利用为生意上的交换条件，把她嫁给一个性情暴戾的老商人作填房。老商人对娘惹多番虐待，使娘惹终于受不了而逃了出来。娘惹对于恶势力从来只会逆来顺受，在家中她没有地位，连生气也不敢大声说话。家道中落加上逃离夫家，她最后终于沦落到卖身的地步。娘惹的母亲亦是一个典型娘惹形象的例子。她对于丈夫与自己的妹妹私通的事仿佛毫不知情也从不过问，连要阻止丈夫把女儿嫁给一个

²⁹ 丘士珍：《峇峇与娘惹》，页 27-28。

臭名远播的男人的能力也没有，最终知道自己的女儿原来被丈夫骗到那么恶劣的老男人手里后气得吐血身亡。

两篇小说里的娘惹形象有所差别，《娘惹与峇峇》的峇峇家庭较《峇峇与娘惹》的峇峇家庭少了一份重男轻女的趋向。林娘惹是个独立自主，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拥有坚毅定力的人。在中学的时候，她与学校的男同学陈彼立谈起恋爱并且珠胎暗结，对此林娘惹的父母不但没有对她感到羞耻，反而因为要迎接新生命而显得雀跃。此外，林娘惹显得更为独立与自主，她不理睬身边的流言蜚语，丈夫死后别人劝她改嫁她也毫不动摇，独自抚养自己的儿子长大。在遇到了李天福后与他坠入爱河，也不顾他们女方是主男方是雇的身份而毅然招赘李天福入门。

《峇峇与娘惹》里的娘惹是个典型的、受到封建思想所影响的女性，她们没有受到教育，也没有自主的权力。一代传一代，皆是如此，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而《娘惹与峇峇》里的林娘惹却不然，她开放热情，并且更是个接受过英式教育、懂得持家又能够接管父亲产业的女强人。两个文本的娘惹形象表现了女性主义在战后的发展情况，以及两位作者在战前与战后所关注的不同的社会议题，既前者女性主义的强调，以及后者民族教育的注重。

第三节：新客的典型形象——《峇》的“阿美”、《娘》的“李天福”

阿美在《峇峇与娘惹》中的角色是一个南来的新客，她原本是个中国的乡下小姑娘，没见过什么世面，既天真又无知。她在南洋接受了英殖民的教育，使原本朴素的她变得时髦开朗而充满活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逐渐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污秽的家庭环境底下。除了自小目睹家中老爷与阿姨的关系暧昧，在她与林峇峇结婚以后，又愕然发现丈夫与自己的亲姐姐有乱伦的关系，后来更知道了阿姨常常与家中车夫关系不寻常，对于单纯的阿美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打击。在家道中落的时候情况更不堪，她不但被丈夫所唾弃，峇顺更企图将阿美赶出这个家。阿美在这个荒唐的家族中形成了一个反叛的角色，她不但不愿顺着峇顺的意思离开，更鼓起勇气告发了峇顺与娘惹杀害老爷的事件。

她的思想跟着光阴急速的转变，她恨这吃人的社会。这吃人的社会沉没了她的青春，泯灭了她的理智。现在，她是醒了，她认清了谁是她的敌人，谁是这社会的始作俑者；她决意踏上征途，牺牲一切，为磐石下的大众谋解放，争自由！³⁰

作者引用了鲁迅“吃人”的意象，反映当时封建的社会环境。阿美一反女性柔弱的一面，证明了女性也能够拥有权力掌握自己的地位。

³⁰ 丘士珍：《峇峇与娘惹》，页 63。

李天福是《娘惹与峇峇》里，林细峇叙说故事时第一个出现的人物，他“卖猪仔”的形象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从中国南来的新客。这类新客的教育水平偏低，到南洋来多从事劳动阶级的工作。

李天福是一名潮州小伙子，以耕种一小片父母遗留下来的贫瘠土地为生。他拥有一个平凡的生活，以及一位贤良貌美的年轻娇妻。原本能够勉强过着安稳的日子，无奈“穷人多子”，他为了满足传统习俗的要求，为新生的孩子按族例宴请乡亲而踏上了卖身到日里当苦力的地步。在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以及海外华人的头脑的当儿，仍有一大批身处于低下阶层的人民，他们盲目地迷信与跟从乡俗，主要原因是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不高甚至大部分属于文盲。作者所表现出的是他对这种封建与不文明的社会的批判，小说中的李天福宁愿将两个新生的孩子陆续卖掉，也不能省下办灯油宴请乡亲的费用，最终连自己也给卖了。

被卖身到日里的人们大多一去不回，他们被殖民政府利用为廉价的劳工，并且还使尽各种能够让这些廉价劳工得以乖乖地留在当地继续劳作的手段。所谓“日里窟，容易入，不易出”，这句话承载了多么沉重的社会背景。然而李天福竟能坚守最初卖身到日里的意愿，契满之后顺利离开那座人间地狱。可是命运却与他开了个玩笑，在他离开家后，他的妻子被人奸污以至带着孩子投井自尽，而三年来辛苦赚来的钱也被自己的二叔骗个精光。但他仍像一只打不死的蟑螂般拥有顽强的生存毅力，利用身上仅剩不多的钱来

到了槟榔屿，靠着一丁点的人脉关系成功找到了在吉打当胶园工头的工作。小说中的王世德与李天福素不相识，只因为李天福是王世德的弟弟王世昌所介绍的人，加上同样是来自中国潮州的同乡人，因此便热情款待李天福让他在店里吃住。这反映了当时的海外华侨社会对宗亲关系的重视，只要一听到对方操着属于自家的方言，便能够把他当做“自己人”看待，无条件地给予帮助。

他在环境条件的促使下，改变了自己的为人与性格，从一个充满正义感、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变成了阿谀奉承、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置自己生命不顾的人。

他为了希望自己能够发财；籍着发财后的声势可回乡去耀武扬威，以便向郭向良清算，为妻儿报复，所以他不惜牺牲一切，廉价出卖自己的青春，不吝自己的劳力；连别人的劳力可以榨取来帮助他建立自己的功绩时，他都不惜利用任何的手段和嘴脸，尽量把别人的劳力也剥夺过来。³¹

李天福为了为妻儿报复，决定要在南洋出人头地，在槟榔屿的时候因为友人的一句话：“番山地方，一定要有人多隆，才容易发财，像你这样年青的人，肯刻苦耐劳，勤慎做事，一有头家多隆，要起色是十分快”成了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想要利用头家的“多隆”来获得自己的“起色”，以便有

³¹ 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页 54。

一天能够回乡去向他的敌人耀武扬威。怎知这一去却是真的再也没回过乡里了。就像许多离乡背井的华侨，当他们抱着满腹对家乡的依依不舍来到了南洋以后，却在被日子慢慢消磨的情况下，逐渐忘了当初离乡的意愿是要再次带着希望回乡去。更何况是在家乡已经一无所有的李天福，当他遇到了年近中年，芳心却空虚寂寞的林娘惹的时候，经济上的依靠加上生理上的需要便更是让他把为妻儿报复的事抛掷于脑后。

在大家都以为他到了吉打以后生活会逐渐改善的当儿，他却以卑微的身份入赘于娘惹家，遭到小一辈的年轻人也就是娘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的鄙视对待，甚至自己在娘惹心目中的位置也一直比不上儿子，或者只是一直被娘惹当做前夫代替品。这种外表风光亮丽而事实上却是委曲求全的心理折磨，最终导致李天福郁郁而终。李天福由一个小伙子转变为中年人的过程，从到卖身到日里，到为卢畅明做牛做马，最后入赘林娘惹家，当中的转变都与现实的残酷息息相关。为了钱李天福不要命地为卢畅明打拼，到了林娘惹家更因为是低阶级的新客而无法在妻子与儿子的面前当个有尊严的丈夫与父亲。伍良之在评论《娘惹与峇峇》时写到方北方在小说中暴露了人性软弱、在现实下低头的一面，他运用了旧现实主义的笔来写这个环境和人物，如实地反映了卖猪仔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倾向。³²因此文本所反映出来的，是在这种弱肉强食的时代下，尊严在金钱的面前仍然是难以抬起头的，而中国文化在英殖民时期的经济与政治环境压迫下更是难以传承。

³² 伍良之：《方北方作品赏析·得鹿失鹿都是梦——娘惹峇峇的梦》，页 50。

阿美与李天福的新客形象成了两大对比，阿美是个在恶劣环境中与恶势力对抗的强者，而李天福虽然奋斗过，但他最终还是成了屈服在恶势力底下的弱者。作者塑造阿美这个形象，表征了当时被欺压的女性，她们需要更多的勇气，来为自己的身世地位作出改变。

阿美，她经过了惊涛骇浪。但，她不灰心，不像旧式的女人一经挫折之后，就要削发做尼姑，投水，吊颈。

时代展开在她面前时美丽的；她已在时代狂涛里跟着浪头涌去了。³³

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里的林厝嫂便是这所谓的“旧式的女人”，她们依靠着家中男人，当受到挫折的时候也只会默不作声，深怕万一有个不对的举止而将被社会所谴责。阿美的形象便鼓舞了这类女性，促使她们在封建制度下觉醒，并对自己的命运作出改变。除此之外，她的形象更代表了当时南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眼看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蔓延，加上他们已在南洋居留一段时间，对这片土地逐渐产生感情，因此便有了像阿美那般想要改革的、使人民觉醒的决心，使时代底下的受害者得以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小结：

³³ 丘士珍《峇峇与娘惹》，页 63。

本文挑选了小说中几个人物来叙述，他们可说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³⁴，分别代表了当时社会上的某阶层人士。两篇小说中，峇峇的形象如峇顺与林峇峇，都是来自富裕的商人家族。他们深受英式教育的熏陶，瞧不起从中国南来的新客。娘惹的形象如峇顺的姐姐娘惹以及林峇峇的母亲林娘惹，她们虽同样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娘惹，但命运却不一样。两个文本当中的峇峇都带出了同样的隐喻，那就是他们的沦落同时也都象征了峇峇娘惹社会的没落。

《峇峇与娘惹》的娘惹没有受过教育，在家中也无自主权，家道中落的时候还沦落至被丈夫虐待，甚至卖身到妓院的地步。《娘惹与峇峇》的林娘惹则是个受过英式教育的女人，她独立自主，亲手带大儿子林峇峇，并且一手打理父亲遗留给她的产业。但由于教育的失败使她最后还是被自己的儿子气死了。

阿美在《峇峇与娘惹》里是个受尽委屈与挫折后，毅然觉醒的女人。她代表了鼓舞女性主义崛起的角色，提醒当时的女性为自己被压迫的身份作出改变。李天福则是当时典型的“卖猪仔”形象。他的教育水平低，只知道用劳力来换取财力，越努力越快能达到目标，因此就算是廉价的劳工，他也拼了命地工作。伍良之在评论《娘惹与峇峇》时写到方北方在小说中暴露了人性软弱、在现实下低头的一面，他运用了旧现实主义的笔来写这个环境和

³⁴ “典型环境”是作者在文本中充分体现现实关系，可通过个别的具体社会环境体现出来的；而“典型人物”则是某人物的性格环绕在他们的特殊环境中形成，典型环境便是形成人物性格、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客观条件。详见于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页221。

人物，如实地反映了卖猪仔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倾向。³⁵在面对经济需要的时候，李天福不惜在金钱的面前低头，久而久之便忘了自己要回乡的意愿，而在南洋终老，就像当时的许多南来移民一样。

第四章 文本中的批判意识

第一节：《峇》和《娘》对社会历史的批判意识

《峇峇与娘惹》对战前的南洋社会重男轻女的状况作出了批判。因为社会的封建思想，而使到娘惹的心灵也被紧紧束缚，导致她在寻求情爱与自由的道路上深受伤害。封建的思想与保守的婚姻制度使娘惹们身心灵上都深

³⁵ 伍良之：《方北方作品赏析·得鹿失鹿都是梦——娘惹峇峇的梦》，页 50。

受毒害，由于生活范围的狭窄，往往使她们的生活受限于一间屋子里，因此闲暇时她们只能用赌博来打发时间，以至于她们沉迷于这种不良的嗜好。这样的风气在 19 世纪时尤其受到知识分子的注意。女权的初步提倡和女学的创办是海峡华人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19 世纪末英国女权运动已经走了好一段路，³⁶但这时的马来半岛以及新加坡虽然深受西方思想所冲击，但这里的娘惹却仍然深受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她们仍是以男性为中心，而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因此在 19 世纪末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维新运动的影响，海峡两地才积极地推广女权和女学思想运动。1897 年林文庆、宋旺相合办的《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刊登了不少峇峇知识分子对于娘惹的文盲与迷信等状况做出反省与批判。³⁷在《海峡华人杂志》中不断有人把这些社会问题表现在文学作品当中，认为那些禁锢少女的风俗应该被解除，并且呼吁父母对女儿多加关注，让她们能够到女校去接受教育以提高妇女的道德观。³⁸因此《峇峇与娘惹》在塑造阿美的形象时，便一反了女性柔弱的一面，给予了她勇于挑战恶势力的态度，批判了在“吃人的社会”底下，人们封建的、把女性当做附属品的观念。

³⁶参阅自 李元瑾：〈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杨松年 王慷鼎：《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 9），页 263。

³⁷ 参阅自 李元瑾：〈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杨松年 王慷鼎：《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 9），页 263-276。

³⁸ 参阅自 李元瑾：〈新加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杨松年 王慷鼎：《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页 284-288。

除了女性地位的强调，小说中也反映了当时的南来华侨对金钱的贪念。为了钱财他们往往不择手段，如小说中，阿美的同学素兰在中学时被一个老师所追求然后与他结婚，后家道中落却被该位老师所抛弃而离婚。阿美听了便将她与自己被峇顺唾弃的命运联想在一起。

唉！可见得有钱的人。容易有人爱，有钱的人也可以随便爱人，不会得人爱者和不易爱人者，都是穷人。所以现在的青年男女讲恋爱，真实没办法，有办法的只是限于有产者。如果你有很多的金钱，你随便都可以乱爱一场！³⁹

文本反映了经济萧条为社会带来的问题，除了像娘惹这种没有自主权的女子在这个时候成了狡猾商人交易上的牺牲品，同时，像素兰这类因家世丰厚而被男人利用的女子也成了受害者。《峇峇与娘惹》揭示了在这场经济灾难中，种种人性的丑恶，而到了《娘惹与峇峇》的时候，方北方更进一步地为这些现象加以描述，直接地表现了因教育制度的不妥当而为社会带来的弊害，强调了良好的教育制度在社会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小说借由对峇峇形象的塑造对当时的殖民教育作出了批判。小说中，峇顺与林峇峇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他们在遇上困难的时候便显得懦弱愚蠢，而且对于家庭也没有多大感情可言。由于上一代的成就，使峇峇们在富裕的家庭下长大，都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低贱的工作他们不屑去做，高

³⁹ 丘士珍：《峇峇与娘惹》，页 47。

尚的又做不来，因此在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只有变卖家当，渐渐地过上了堕落的日子而从此站不起来。因此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便影射了峇顺与林峇峇的形象。同时，他们的形象也反映了峇峇在殖民教育底下的状况，他们对自己的亲戚冷淡，对父母缺乏尊敬，甚至对自己的妻子也不善。他们在错误的观念中往往作出错误的选择而使他们陷入无法挽救的悲剧当中。《娘惹与峇峇》描写林细峇时，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接受良好的华文教育，思想开明而理智的峇峇，使他成为峇峇下一代的新希望。

一英说：“即是说我们懂得了英文，我们就可以利用英文去研究一些进步的科学，而不是读懂英文而让英文来利用我们。不过中国人，只学习英文而不认识中国文字，那就太差了。”

林细峇也严正地说：“我也有跟你一样的见解。好像我的父亲，因为只受英文教育，对于中文教育完全放弃，因此影响到他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完全没有印象。连本身的家乡语言也讲不出口，弄成与族人毫无感情；几乎变成洋人一样。”⁴⁰

文本直接从林细峇与表姐一英的对话中对英殖民教育作出了批判，说出了峇峇们当时的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教育制度必须要改革的情况。

⁴⁰ 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页 138。

除此之外，《娘惹与峇峇》亦批判了当时在新思潮冲击下的人民心态。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为各个海外华侨引进了所谓“新思想”、“新文化”等等的新观念，西方的开放式教育、自由、平等以及各种各样的口号涌入中国。

身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同时也被殖民教育所影响，南来的华侨在接受当地思想的同时，也间接从中国的五四文学运动中接受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接受并不代表人们能正确理解和使用该理念，方北方在《娘惹与峇峇》便对此进行了讽刺。

郭向良，是乡中一个二十七八岁的潇洒的青年。他凭家庭的富有，到省城混过了三四年新学。但他带回家来的，只是一纸高等小学修业期满的证明书。虽然只是修业期满，一时却也提高了他的地位……因此他时常以乡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自居，无论在任何场所，他处处提倡文明，高唱改良乡俗。特别是对于男女阶级，更主张应该平等，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他到处高声疾呼应该铲除。⁴¹

郭向良在故事里利用男女平等的口号作为调戏良家妇女的理由，最后甚至迫使李天福的妻子林厝嫂蒙受他的奸污而投井自尽。除此之外，对于西方开放的伦理观念也被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扭曲，因而导致许多荒唐的事来。

⁴¹ 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页 27。

林峇峇当日军踏上檳城时，他身边的现款差不多已经花光，但不久后，靠着日军开放赌场的机会，他又发了财……要是林峇峇不是受洋文教育的话，那恐怕这场财是与他无缘的。⁴²

由于林峇峇精通英语，又拥有西方人开放的思想，因此当一位日本军官看上他年轻貌美的新太太时，他认为太太并无排斥的意思，便把自己的太太送给了日本军官以换取不被日军干扰的安逸生活，以及在赌场的高收入工作。这句“要是林峇峇不是接受洋文教育的话，那恐怕这场财是与他无缘的”明显表现了作者对于这些被滥用了的“新思想”给予讽刺性的批判。

《娘惹与峇峇》在描写林娘惹与陈彼立、李天福的情节当中也反映了当时传统的中国人与峇峇思想的差异。例如在她要求陈彼立入赘林家时，陈彼立却认为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应该要为家族传宗接代，况且对于身为新客的陈彼立父亲来说，儿子被招赘是件不光彩的事。另外，在林娘惹与李天福商量林峇峇上学的事时，李天福认为华人必须懂得中文，应该把林峇峇送到华校就读，但是林娘惹却不这么认为。由于当时从中国南来的新客多从事低阶级的工作，加上英国统治时期以英语沟通以及英式教育成为马来亚的语言和教育主流，因此林娘惹便理所当然地觉得让孩子接受英式教育便能赶上社会的主流，日后更容易融入上层人士与得到高收入、高阶级的工作。从这方面来看，峇峇们在马来亚生活久了，即使他们还保有祖先传承的习俗，但却

⁴² 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页 124。

不再在意其中的文化意义，而只是盲目地跟从。反之，他们所在意的却是经济上的考量，例如在小说中林娘惹们为林峇峇选择婚嫁对象时，多以生意上的利益作为选择的条件，以选择在经济上对自家生意有帮助的对象为主。反观，新客们却更加注重文化的传承，即使是文盲如李天福，却仍然知道学习母语的重要性而建议林娘惹把林峇峇送入华校就读。

第二节：《峇》和《娘》对“峇峇”自我身份认同的批判

从两篇小说对峇峇的形象塑造可看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峇峇们常以英伦子民自居。本文对“身份认同”的概念来自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

身份认同指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这个字在中文书籍里有时被翻译成身份，有时被翻译成认同或身份认同。“身份”在《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出身和社会地位”，只能当名词用；“认同”的翻译则是“认可，赞同”或“犹言承认是同一的”。⁴³

当时的峇峇与南洋土著、南来新客有着不同的观念和文化，形成了他们在族群的概念上拥有属于他们的族群特质。这种特质，指的是他们“自觉到”和自己族群的成员共同享有的历史起源、语言、价值观念、起居习惯等

⁴³ 转引自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华社研究中心，2006年，页2。

有别于其他的人或其他的族群。⁴⁴两篇小说中的峇峇往往将自己归类为英伦子民，反映了当时峇峇在身份认同上的共识。

丘士珍《娘惹与峇峇》里写到，阿美听说“过番邦的人最瞧不起新客”、“新客在一般侨生者的眼中是一只‘峇味’，即中国上海人所为猪猡的意思”。在方北方的《娘惹与峇峇》里，也有许多林峇峇对于中国人充满偏见与嫌弃的描写。

“林峇峇，你是什么人？”

林峇峇一时虽然不会说他是英国人。但是他往往会对那问他的人这样说：

“我的祖家是英伦。”他得意洋洋地好像不表示他的祖家是“英伦”，就觉得他不够光荣，而会失去高尚的风度一样，因此当亲朋戚友提起自己的国家来的时候，他总会用卑微不足道的口吻说：“臭屎Country，我唔承认她。”⁴⁵

这是许多峇峇惯有的“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想法，在描写他们讥笑中国人的同时，作者亦讥笑他们在中国人面前自视清高，在外国人的面前却感到自卑的矛盾心理。19世纪的马来亚殖民地教育主要是以效忠英王为目的，学校里的历史地理主要是英国的发展史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的光荣史，因此峇峇娘惹们的生活也默默地以英国方式为理想，想尽办法使自己尽

⁴⁴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页5。

⁴⁵ 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页105。

量英国化，⁴⁶造成了峇峇们以身为殖民地的主流族群身份，鄙视南来的新客。

伍良之在评论林峇峇时有些过于激烈：林峇峇就好像富人家豢养的一条狗，它曾经有过风光的日子，但当富人家道中落了，这只狗就变成人人喊打的癞皮狗，林峇峇的一生就是这样。⁴⁷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终究不是林峇峇原来的人格问题，他是实实在在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因此，本文也同意伍良之所说的：娘惹峇峇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并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时代所造成，一个不能改变时代的人便只能让时代把他淹没。⁴⁸林峇峇到底也是受到了唯一养育她的亲人林娘惹的影响才会培养出那样不可理喻的人格来。林娘惹也终究是承袭了上一代的教育方法来教导孩子，因此文本亦反映了这种不良的教育方式对下一代造成的误导与伤害。

林峇峇和好几位朋友，在路上遇见李天福从他们的前面走来。林峇峇一时想避开他，可是李天福已开口把他叫住了，林峇峇于是不得已用英语问他继父说：“叔叔，你叫我做什么？”李天福不了解他到底对他说些什么话，因此只能呵呵地糊应几句。林峇峇听到他继父只呵呵地几声，心里很

⁴⁶ 参阅自 吴进：〈峇峇〉，锺怡雯 陈大为编：《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2007》卷三，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页 356。

⁴⁷ 伍良之：《方北方作品赏析·得鹿失鹿都是梦——娘惹峇峇的梦》，页 53。

⁴⁸ 参阅自 伍良之：《方北方作品赏析·得鹿失鹿都是梦——娘惹峇峇的梦》，页 53。

不爽快，便指着李天福对他的朋友说：“He is not my father, he is a Chinese.”朋友们都哈哈地笑了。⁴⁹

年轻一代的峇峇们在英伦教育的熏陶下，从没想到自己的祖父母或是父母原本也同样是来自中国的新客，文本反映他们只是一味地效仿英国人，在描写他们讽刺南来新客的同时，亦在讽刺他们的无知。萧遥天在为方北方《峇峇与娘惹》作序时便为这样的情况作了一个比喻：

殖民地红毛教育培养他的英伦祖家观念与奴性，什么都是英伦第一，祖家第一，惟恨头发不红眼睛不蓝。记得我小时候听人谈鬼，那人谈到有一个女鬼，夜间起来梳头发，把头摘下来用舌头这边舔，那边舔。当时被吓得毛骨悚然。现在套用这个故事：峇峇也好像把头摘下来，用舌头在舔，舔淡了他的黑头发，使他变黄变红；舔淡了他的黑眼睛，使他变蓝变绿……可是那个用来舔头发舔眼睛的舌头是长在谁的头上呢？可怜的峇峇，我？我？我在那里呢！⁵⁰

对于当时峇峇们这种自相矛盾但是却还没有自我察觉到的言行举止，萧遥天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作了非常讽刺与批判性的批评，认为他们就像是以为自己在用自己的舌头舔自己的头发眉毛，却没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峇峇们以为学习了英国人的语言，穿上西装像英国人一样互相拥抱行

⁴⁹ 方北方：《峇峇与娘惹》，页 94。

⁵⁰ 萧遥天：〈再版序〉，1946年9月15日，方北方：《峇峇与娘惹》。

礼，就能变成英国的子民；但事实上在英国人或中国人的眼里，他们终究不可能成为英国人，他们终究还是黑眼睛黄皮肤，更不堪的是他们在事实上既不是纯正的中国人，更不是英国人。因此，特殊的混血关系，加上他们一味效仿的模样就是比别人更来得不伦不类。两篇小说在描写峇峇自我身份认同的时候，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仅仅是身份认同上的错误观念，便足以使他们的族群文化走向没落。

小结：

《峇峇与娘惹》批判了封建社会对女性带来的伤害，封建的思想主要因为社会上的教育制度出现问题，而《娘惹与峇峇》则对之起了承接的作用，对英殖民教育作出批判，认为英式教育是导致峇峇伦理观念薄弱，忘记自己的祖宗与文化的始作俑者。

相较《峇峇与娘惹》，《娘惹与峇峇》更直接与多方面地对小说中人物进行批判，而且也充分地表现了作者对民族教育的关怀。文本批判了在金钱底下低头的新客，为了达到商业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商人，自以为是英国子民的峇峇，而这些批判都是基于殖民教育的误导。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研究成果

从两篇小说的批判意识来看，在战前的《峇峇与娘惹》所反映的是作者对广大女性群众地位，以及人民思想的关怀。作者发现社会上封建的思想是束缚与阻止人们进步的障碍，失败的家庭教育也是间接致使下一代步入歧途的根源。《娘惹与峇峇》则更深入一层地，不只是对人民思想，甚至是对

整个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关怀。南洋经过战争的洗礼，马来亚人民在合作对抗日军的时候便开始对这片土地起了捍卫的心理，因此可以在《娘惹与峇峇》看到作者对峇峇们的行为感到着急，原因是担心华人如果都像峇峇们那样被殖民政府或是当地土著所同化，那么华人的文化将很快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像丘士珍、方北方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虽然一直在为马来（西）亚努力维持着华教的发展，但是小说中的峇峇型人物至现今仍是处处可见。他们也许小学时接受过六年的华文教育，但是小学毕业后便进入国民中学，开始与中文疏远。当笔者还在独立中学就读的时候，便常常听见对外人对华教发出的质疑，认为接受中文教育的学生多数无法掌握英语及马来语，加上政府一直以来对独中文凭的否定态度，毕业以后必定难寻出路。甚至到了大学进入中文系，更使笔者看到，在华裔社会里有更多的人对这门科系投以不解、怀疑的眼光。故笔者认为暂且放下文学的形式美不说，在鼓励与倡导华文教育发展的时候，两篇小说确实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当时的南来作家尚且已对自身文化在马来亚的去留感到焦急，已经身为马来西亚华裔子民的我们，就更应该以前人的教训为借鉴，积极地维护母语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节：研究限制和未来建议

本文在做有关峇峇思想观念的研究方面，缺乏了参考峇峇作家对本身族群的看法，在 19 世纪初的《海峡华人杂志》刊登过不少有关当时南洋知识分子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作品，尤其是一些对女权和女学思想非常关心的知识分子如林文庆、宋旺相、李真娘、箫保龄等，当中也有像李真娘那样的峇娘惹作家。⁵¹他们看到娘惹的地位问题，因此纷纷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论文以及小说，希望通过文学来达到使人民醒觉的作用。这些资料笔者只是从李元瑾的<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中取得二手的资料，也由于《海峡华人杂志》是以英文为媒介因此没有能力一一阅读。故笔者建议若要研究关于峇峇的族群思想与观念可从《海峡华人杂志》中获取资料作为参考。

另外，在分析两篇小说的批判意识方面，本文缺乏了通过作者背景来反映更深一层的作者的情感意识。笔者在收集两名作家资料的过程中较偏重于方北方的资料，而缺乏叻丘士珍在南洋较仔细的创作资料，因此本文并没有对两名作者在南洋作出的贡献作更深入的说明。笔者认为《峇峇与娘惹》和《娘惹与峇峇》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巧妙优美的技巧，如黄锦树批评方北方“见佛杀佛，逢祖杀祖”⁵²，但就拿以上两篇作品来说，小说确是如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这些是历史文献以外，得以让人更深入了解峇峇思想观念的另一类史料。对于丘士珍与方北方所表现的对社会的关怀意识本文缺乏

⁵¹李元瑾：<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杨松年 王慷鼎：《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 9），页 264。

⁵²转引自 方北方：《方北方全集》，页 6。

深入的探析，两作家的作品在马来亚战前与战后皆具有代表性，但由于时间安排上的疏忽笔者缺乏做这方面的阅读。因此建议未来研究者可通过解读作者更多的作品，以探讨这些作家对马华文坛作出的贡献。

参考书目

1. 方北方：《方北方全集》，吉隆坡：方北方全集出版工委，2009年。
2. 方北方：《娘惹与峇峇》，教育出版公司印行，1964年。
3.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UCSCAM)，1986年。
4. 傅乐成：《中国通史》，弘扬图书有限公司印行，民国六十六年。

5. 何国忠：《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华社研究中心，2005年。
6.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华社研究中心，2006年。
7. 江洛辉：《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99年。
8. 马伦：《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书辉出版社，1991年。
9. 丘士珍：《峇峇与娘惹》，
10.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11. 王先霈 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12. 吴进：<峇峇>，锺怡雯 陈大为编：《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2007》卷三，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13. 伍良之：《方北方作品赏析》，Semarak Publishing，1998年。
14. 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年。
15. 杨松年 王慷鼎：《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9），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联合出版，1994年。

16.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